

海外视野

美高校多元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郭英剑

长期以来，美国高校中广泛存在一项名为“DEI”的计划及其相关政策措施。该计划的目的是为了创造包容性环境，让所有学生都能茁壮成长。然而，近年来这一具有历史渊源的计划却受到来自各方，尤其是相关州政府与立法机构的批评和阻击。可以说，DEI 当下正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

那么，DEI 究竟是怎样的计划？它何以成功，又何以遭受诸多批评与阻击？它所发生的变化将对美国高校产生何种影响？

行业规模呈“爆炸式”增长

DEI 是三个英文单词 Diversity（多样性）、Equity（公平性）与 Inclusion（包容性）首字母所组成的一个组织框架的简称。该框架旨在促进“所有人的公平待遇和充分参与”。这三个字母也代表着三种紧密相连的价值观。

所谓“多样性”，指构建员工队伍的多样性，比如一个团队组织中应包括不同性别、文化、种族、宗教、阶级等群体人员，以及残疾人员；所谓“公平性”有公平、正义的概念，包括公平补偿、实质平等，以及关注社会差异和资源分配，乃至历史上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的决策权等；所谓“包容性”，是指创建一种组织文化，使所有人员都感到自己的声音会被听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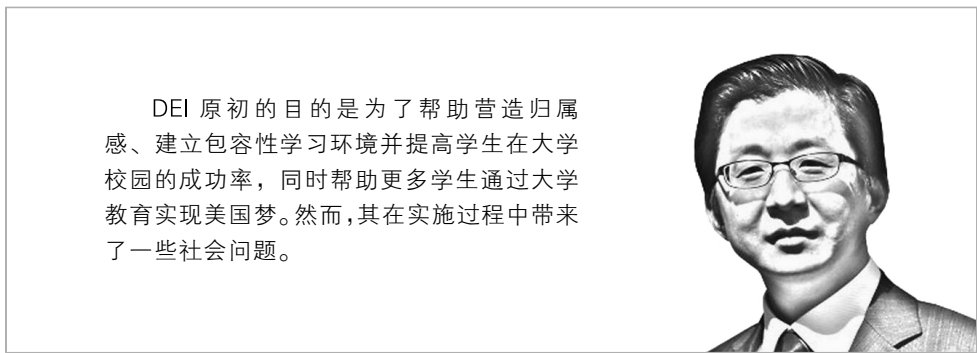
DEI 源于美国的“平权行动”。1961 年，时任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其中规定雇员在受雇期间应受到公平对待，不论其种族、信仰、肤色或国籍。至 1964 年，美国《民权法案》提出禁止基于种族、肤色、宗教、性别或国籍的歧视。此后，在平权行动的实践中，无论是美国最高法院的判例还是一些州的法律，都明确禁止种族偏好。

DEI 的支持者声称，平权行动既要补偿文化统治阶级过去的歧视、迫害或剥削，也要解决现有社会中的歧视问题。以至于后来，DEI 成为维护历史上代表议题不足（主要是非裔以及少数族裔）群体的利益，并反抗各种利益不公与社会歧视的“尚方宝剑”。

早期，DEI 以一种企业培训的形式出现，但后来在美国学术界、学校和医院得到广泛认可并大面积实施。随着时代变迁，DEI 成为许多企业促进族群与个体平等的重要法则。新世纪后，许多企业为实施 DEI 组织了大量培训。

据报道，2003 年，美国企业每年在多元化方面花费达 80 亿美元。至 2019 年，美国《时代》周刊称 DEI 行业规模呈“爆炸式”增长。在学术界，当年的一项调查发现，DEI 工作的支出比前 5 个学年增加了 27%。

近年来，美国许多大学与研究机构也开



DEI 原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营造归属感、建立包容性学习环境并提高学生在大学校园的成功率，同时帮助更多学生通过大学教育实现美国梦。然而，其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

始以不同方式对 DEI 作出承诺，包括创建政策、安排计划和任命专门的工作人员。事实上，早在 2014 年之前，面向学生和教授的 DEI 信息就在美国高校中广泛传播，许多学校要求就该主题进行培训并举办会议。大学提供的许多奖学金以及诸多机会，甚至都带有鼓励多样性的目的。

在美国，许多学校、医院与企业都设有专门的 DEI 职位。在一些学校中，DEI 工作人员负责要求所有教职员签署他们对多样性承诺的书面确认书。

面临越来越多批评

DEI 的出现无疑体现了一种美好愿景，在现实中也确实有良好的效果。然而，近年来，它所面临的批评却越来越多。

比如，作为 DEI 最常见的一项工作，多样性培训便经常被认为无效甚至适得其反。对此，一个最通俗、常见的说法是——所谓 DEI 的培训乃至职责，不过是为了防止人们对学校提起诉讼。换言之，DEI 的各种培训仅仅是为了让人们在言语与实施过程中，注意不触碰某些敏感的话题，但并未触及关键问题本身，比如真正的种族歧视问题等。这种培训使少数族裔在求职或工作中处于一种政治正确、态度可亲，但又四处碰壁的状态中，其英文表述就是 glass ceiling（玻璃天花板）——看上去都很美好，但因为存在巨大障碍，永远无法达到那个美好的高度。

根据美国大学教授协会 2022 年的一项调查，美国 1/5 的高校将 DEI 标准纳入终身教职标准。在学生人数超过 5000 人的院校中，该比例更高达 45.6%。在高校中，DEI 往往因为涉及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而遭到学术界的强烈批评。

比如，美国很多大学都曾使用强制性的

多样化声明，其中包括人们在过去对多样性的贡献，以及如果被录用，应努力促进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计划等要求。一些大学招聘时会将多样化声明作为遴选申请者的重要依据。

据报道，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 2018—2019 年招聘生命科学领域的 5 个教职时，仅仅根据多样性声明便淘汰了 3/4 申请者。此举遭到不少人的批评。

美国学术自由联盟曾在 2022 年呼吁废除这种强制性的声明，称其鼓励了愤世嫉俗和不诚实行为。也有学者指出，大多数学术工作与多样性无关，强制学者发表如此声明，等于迫使学者违背其了解事情真相的愿望。

一些批评家则直言，DEI 已成为一种独特的意识形态或政治议程，引起大学过度政治化。但事实上，大学的核心是自由表达思想。

高校寻求自我改变

在本专栏 2023 年 7 月 11 日的文章《“哈佛模式”终结，美高等教育影响几何》中，我曾谈到美国高等法院作出裁决——认定哈佛大学和北卡罗来纳大学基于种族的招生计划违宪。这项裁决意味着种族身份将不再被视为大学录取的一个因素。此判决颠覆了数十年来，使美国高校建立充满活力的多样化环境的规定，因此在美国高教界引发剧烈震荡，几乎所有顶尖大学都在第一时间作出回应。

在我看来，美国高等法院的裁决是 DEI 遭受重创的开始，也是高校寻求自我改变的开始。

应该说，正是从那时起，美国高校大都进行了防御性调整。有些学校从办公室和职位名称中删除了“多样化”一词；有些学校正在关闭根据身份为学生所设置的校园空间；有些学校结束了多样性培训；有些学校则已经不再要求所

有教职员书面确认他们对多样性的承诺等。

但事实上，无论是最高法院的判决，还是高校在寻求的自我改变，都与近几年美国学术界的自我反省有极大的关系。

比如，2023 年 4 月，包括诺贝尔奖获得者在内的 29 名科学家发表了一篇文章。文中，作者认为，基于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而强制执行的理念，已经威胁到整个科学事业。

近年来，美国校园的言论冲突事件频频发生，DEI 办公室及其官员经常对校园所邀请人员的演讲进行干预，进而引发人们对校园环境、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影响的争论。比如，2021 年天体物理学家艾伯特因为批评了 DEI，导致其在麻省理工学院的讲座被取消，这引发了媒体的广泛关注。麻省理工学院为此还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调查该校的学术自由状况。

禁止 DEI 的法律法规接连出台

2020 年以来，DEI 越发成为美国政治的焦点。许多州都在考虑或已经通过针对公共机构中 DEI 的立法。

2023 年 3 月，美国得克萨斯州众议院通过了一项附带附加条款的法案，禁止将联邦资金用于高校的 DEI 项目。同年 5 月，该州还通过立法禁止在公立高校中设立促进 DEI 发展的办公室和项目。在爱荷华州，2023 年 3 月也提出了一项禁止公立大学 DEI 支出的法案。今年 1 月，佛罗里达州教育委员会提出禁止将联邦或州资金用于大学的 DEI 项目。

美国《高等教育纪事》追踪了 2023 年以来该州 28 个州和国会的 81 项法案，这些法案都禁止大学设立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办公室或聘任相关工作人员，禁止强制性多样化培训，禁止机构在招聘和晋升时使用多样化声明，或禁止大学在招生或就业时考虑种族、性别、民族或国籍。

虽然上述立法法案的名单及其结果还在持续更新中，但截至 2024 年 3 月 22 日，其中的 13 项已获最终立法批准，11 项已经成为法律，33 项被提出但未通过或被否决，其余尚待通过。

上述法律法规的通过将会深刻影响美国高校多元化的外部环境，也会引发与多样性、公平性与包容性有关的内在机制的重新规划。

DEI 原初的目的是为了帮助营造归属感、建立包容性学习环境并提高学生在大学校园的成功率，同时帮助更多学生通过大学教育实现美国梦。然而，其在实施过程中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比如因为照顾一些少数族裔，而导致一些非少数族裔的人遭受不公平待遇等。这些问题同样需要人们严肃对待，并拿出解决方案。

有感而发

师生互选呼唤导师信息公开

■马星宇

近日，西北工业大学航空学院教授吕震宙在个人主页将指导学生人才培养的成效与教学科研的成效和盘托出，引发众多网友惊呼其为“别人家的老师”。舆论也对吕老师的工匠精神表达了钦佩之意。

相较于本科生，导师在研究生培养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某种程度上说，继续深造的本科生考生在择校报考时，考虑的不仅有学校的光环效应，更加期待遇到名师、良师。

现实中，信息公开制度在教育领域，特别是招生录取环节、教学质量与就业质量等方面全面铺开，考生在择校时，对院校、学科、专业的了解尚且有相对透明的指标参考，但对导师的了解却往往只能来自官网上简短的导师简介，以及所在学校同学口耳相传的只言片语等，对导师的所有期待只能根据自己寻觅的踪迹而无限遐想。

尽管多数高校已实施硕士研究生导师、学生的互选，但往往将其置于紧张的复试环节或开学报到初期，对导师个人信息披露而言，也没有机制上对院校、学科、专业的了解尚且有相对透明的指标参考，但对导师的了解却往往只能来自官网上简短的导师简介，以及所在学校同学口耳相传的只言片语等，对导师的所有期待只能根据自己寻觅的踪迹而无限遐想。

吕老师行为的可贵之处便在于为研究生招考互选提升信息披露度、师生匹配度提供了示范效应。

既然学校有义务和责任披露总体的招生录取决策考量、人才培养质量、就业质量，导师自然也有义务公开其教学科研、社会服务和人才培养的成效。显然，这不仅能依靠像吕老师这样的导师的自发行，院校也要建立一定的导师信息披露机制，制定必须公开的事项清单，从而满足考生择校、择院、择师决策的基本信息需求。

某种程度上说，导师个人育人信息的公开将激发导师培养学生、学术科研的内生动力，那些以为选聘职称后就进入学术“休眠”或育人倦怠期的“三元”导师，也将在这种公开中露出真实面目。

研究生人才培养的特性决定了导师角色、作用的关键性，个人信息的“犹抱琵琶半遮面”只能使信息差不断扩大。师生难以匹配带来的不仅是学生融入师门学习的困扰，也必然带来导师指导学生的痛苦。当然，强调导师信息公开的同时也应确立对考生信息采集内容的优化及其信息运用的具体要求，为院校录取学生、导师了解学生提供更加全面、翔实的信息依据。

■席光 田美

作为全球教育开放程度的重要指标，国际留学生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反映一个国家高等教育的影响力和吸引力。随着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来华留学生人数稳步增长，我国已成为全球最受欢迎的留学目的地之一。

然而，对于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的原因，学者们还莫衷一是。这些学生究竟是追求高质量教育还是高额奖学金，抑或是受到中国独特文化的吸引？新冠疫情后，国际高等教育交流格局的重塑对国际学生来华留学又有怎样的影响？

针对这些问题，笔者所在的研究团队于 2023 年 5 月启动了一项全国性调查研究，试图分析影响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相关因素，共有 41 所所高校 1411 名来华留学生参与了此次调查。

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最受看重

研究表明，国际学生对来华留学的选择受我国全球影响力、高等教育水平、社会文化生活、留学成本效益和来华留学信息来源等多维度因素影响。

这其中，留学信息来源的影响力平均得分最低，为 3.33 分，留学生感知到来华留学成本效益的平均得分为 3.72 分，我国高等教育水平平均得分为 3.89 分，社会文化生活的平均得分为 3.78 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的平均得分最高，为 4.08 分。这意味着国际学生对这些维度因素测量题目的赞同程度介于“较为重要”和“非常重要”之间（留学生对测量题目的回答从“完全不重要”到“非常重要”共分五个等级，分别赋值 1~5 分）。

在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多维度动因中，留学生认为中国的全球影响力是最为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我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再次是中国的社会文化吸引力和来华留学成本效益，而留学信息来源的重要性相对较低。这体现了我国高等教育在世界舞台上不断增强的影响力，以及为留学生提供高质量教育和文化体验的巨大潜力。

学生背景不同，考虑因素各异

为进一步分析不同背景的国际学生在选择来华留学时所受不同因素影响的差异情况，我们以学生背景因素（性别、国籍、就读

大学层次、专业、学习阶段）为分类变量，进行了组别比较。

结果表明，不同性别、来源国、就读高校水平、专业和学习阶段的来华留学生，在选择来华留学时考虑的因素在许多方面存在显著差异。

与女性来华留学生相比，男性来华留学生更认同同等教育水平和我国的全球影响力对其留学选择的影响，平均得分较女性分别高 0.21 分、0.19 分。

来自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欧美和大洋洲地区）的留学生对高等教育水平、留学信息来源、我国的全球影响力、成本效益 4 个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存在显著差异。在选择来华留学时，这 3 个组别的国际学生对上述 4 个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两两相比的平均得分最大差异分别为 0.38 分、0.32 分、0.28 分、0.14 分。

在我国 QS 排名前 300 的高校和其他高校就读的来华留学生，对高等教育水平、我国的全球影响力、留学信息来源、社会文化生活 4 个维度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也存在显著差异。相较于其他高校留学生，前者在选择来华留学时更重视高等教育水平、我国的全球影响力、留学信息来源、社会文化生活，其平均得分较其他高校留学生分别高 0.29 分、0.21 分、0.15 分、0.12 分。

选择来华留学时，就读人文社科、理工、医学、经济管理等领域专业的来华留学生，对高等教育水平、中国的全球影响力、留学信息来源、成本效益、社会文化生活 5 个维度因素重要性的认识均存在显著差异——他们在选择来华留学时，对上述 5 个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两两相比的平均得分最大差异分别为 0.35 分、0.35 分、0.20 分、0.20 分、0.20 分。

来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对高等教育水平、我国的全球影响力、留学信息来源、成本效益、社会文化生活 5 个维度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也存在显著差异。与来华攻读本科学位的留学生相比，来华攻读硕士和博士学位的留学生在 这 5 个维度因素上的平均得分分别高 0.47 分、0.46 分、0.28 分、0.26 分和 0.11 分。

招生政策应更精细化

上述调查结果可以帮助国内高校更好地理解国际学生选择来华留学的动因，为制

定和完善留学生教育政策和招生策略提供实证依据。为了进一步吸引国际学生来华留学，笔者特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第一，高校应根据学生的个人背景制定更精细化的招生策略。为了更好地提升招生效果和满足学生的个性化需求，高校应通过市场调研、数据分析等方式，深入了解不同国家和地区、不同专业、不同阶段学生来华留学的主要动因，根据不同目标群体的特点定制招生宣传和沟通策略，优化招生流程。

比如，高校应为亚洲学生提供更多奖学金机会，对非洲学生则要更多强调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与高等教育水平；在对来华留学硕博研究生进行招生宣传时，应该比招收本科生来华留学生更着重强调中国的高等教育水平，并在培养计划中为硕博生提供更多实践机会等。

第二，持续推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我国全球领导力、社会秩序和公共治理能力的国际影响力。我国应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积极、主动的作用，通过与世界各国加强合作和交流，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持续增加技术进步与科研创新投入，在保持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增强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加强法治建设，优化公共服务，通过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吸引更多国际学生来华留学。

第三，提高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我国应进一步强化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提升高校教学科研水平和学术影响力。深化高等教育国际化改革，鼓励高校根据自身定位，发展优势与特色学科，积极引进国际知名教授、广泛引进海外青年学者，丰富发展国际化课程体系与教学内容。

第四，持续提升我国文化吸引力。高校应积极构建灵活多样的中国文化和国情教育社会实践体系，鼓励来华留学生参与社会实践活动，全面了解中国。适当增加中国的流行文化体验，帮助来华留学生感知中国文化的多样性和生命力。

第五，开展留学生就业创业教育与服务。提供企业实习与职业发展机会，允许来华留学生在在校期间到企业带薪实习，试点放开留学生在我国就业与移民限制。积极探索来华留学生管理与服务“制度创新”，提高服务专业化、职业化水平，提供便捷、精准的外国人出入境、签证、住房等服务。

（作者单位：西安交通大学）

中国大学评论



复旦大学教育发展研究院副研究员



同濟大學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

近日，全球数据分析服务公司“科睿唯安”发布了《2023 中国国际科研合作现状报告》，分析了 2013—2022 年间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的科研合作情况。报告指出，包括美国、中国、英国、德国等在内的全球 TOP10 科研大国的国际科研合作规模持续扩大，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质量和影响力不断攀升。

然而值得关注的是，尽管从发文规模看，我国的国际科研合作论文数量变化不大，但增速却出现了持续大幅回落的现象。至于国际科研合作论文的占比，我国从 2019 年起持续回落，2022 年已降至 20% 以下。相比之下，英国、法国和澳大利亚的占比在 50%-60% 之间。

知识无国界，合作是潮流。伴随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国际科研合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2021 年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中，原本分散在各章节的国际科技合作相关内容单独成章，凸显了“国际科技合作”成为我国科技创新工作的重要部分，高校科研合作更是教育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核心内容。

从全球范围看，国际科研合作被认为是推动世界一流大学建设的重要途径之一。例如，英国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占比常年 在 50% 以上，2022 年已接近 65%；美国哈佛大学、斯坦福大学的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占比也在 50% 左右。

相比之下，尽管我国有关部门和高校大力支持并拓展国际科研合作，但与世界顶尖高校相比，国内高校在这一指标上的差距依然非常明显。

国际科研合作论文的指标之所以重要，原因在于通过国际交流与合作产生的科研成果能在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高显示度。有些高校虽然科研成果体量不小，但国际科研合作论文占比相对较低，使得高校整体的全球学术声誉和国际影响力上不去。

这意味着提高科研国际交流与合作程度有利于增强我国高校的学术影响力。特别是对于顶尖研究型大学而言，提升它们的国际科研合作能力不仅重要而且紧迫，因为这类大学在我国扩大国际科技交流合作、加强国际化科研环境建设、形成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开放创新生态中是无可替代的核心节点。

总之，不同国家的研究人员走到一起，进行观点和思维的碰撞，共享科研设施和各种科研资源，有助于激发全球的科研活力，加速全球科技进步。我国高校应始终坚持推动科研人员加强国际交流与合作，对接全球科学与技术前沿，在全方位的交流与合作中逐步实现自立自强。

近年来，尽管国际科技领域出现一些逆全球化的现象，但是知识的全球流动和共享的趋势不会改变，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的知识生产值得我们积极拓展合作。随着科技的持续发展、全球经济贸易关系的日趋紧密，以及国际人才流动的频率加快，全球化与国际合作依然是推动世界进步和发展的核心动力。事实上，只有让更多发展中国家充分接触和利用更先进的科技，才更有助于人类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问题，促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

新冠疫情期间，受多种因素影响，国际学者来访、国内高校教师和科研人员出国访学都出现断崖式下跌。作为促进国际科研合作的最重要途径，上述措施的受阻必然制约我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增长。疫情后，很多高校在国际交流与合作的恢复方面做出诸多努力，但受制于国际大环境影响，进展并没有预期那么快。

部分国家在尖端科研领域对我国采取遏制乃至封锁的策略，但在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可持续发展领域仍保持了相对较高的开放度，我国高校要把握这种基本态势，抓住机会积极拓展合作——

首先，深化国际科研合作仍是当务之急。我国高校要根据国际交流合作的发展阶段，准确定位自身，制定国际科研合作战略。

其次，部分顶尖研究型大学要转变“受援助”思维和“跟跑”思维，在国际科研合作中学会承担更大的责任。

再次，我国高校要转变将北美和西欧作为最主要科研合作对象的思维定式，在全球范围内精准分析和寻找合作对象，建立更多边、多元的合作模式。

此外，还要加大国际交流与合作队伍建设，既要重视专职国际事务人员的培养，也要重视全体科研人员国际交流与合作能力的提升，促进他们在更充分的国际交流与跨文化交往中不断拓展全球学术网络。

最后，要克服国际交流与合作共同体“老龄化”问题，在中青年国际事务工作者和学术人员中拓展更加稳定的合作关系，不断扩大我国高校国际科研合作的“朋友圈”。

高校国际科研合作增长势头亟待恢复